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三國演義

上

罗贯中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三 国 演 义(共两册)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北 京 出 版 社 重 印

北 京 市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字 数 726,000 开 本 787×1092毫 米 $\frac{1}{32}$ 印 张 $33\frac{7}{8}$ 插 页 5

1953年11月北京第1版 1973年12月北京第3版

197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70,000

书号10019·600 定价2.30元

I262.4

36

2:2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三国演义

下

罗贯中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664606

前 言

三国演义，也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或三国志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流传极广，影响很大，为人民所熟悉。

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叙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为止，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晋朝史学家陈寿把这段历史编成史书三国志，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增补了许多材料。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也是一本写三国历史的史书。此后，有关三国的故事一直流传不断。从唐朝李商隐的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以看到，当时已用三国人物作为笑谑的材料。宋、元时代，三国人物已由民间艺人带上讲台或舞台，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说三分”(即说三国故事)已是“说话”中的独立科目之一，并出现了专说“三分”的著名艺人。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故事的最早写定本，是元代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年)的新安虞氏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可能就是说话人的底本。全相三国志平话共分上中下三卷，从刘秀赏春、司马仲相断狱开篇；正文从桃园结

义开始，以诸葛亮病死结束，长达八万多字，虽然叙写简率，但三国故事的始末已粗具梗概。金院本、元杂剧也常常搬演三国故事，现今存留的剧目就有四十多种，剧本有一、二十种。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就是在上述史书和平话、戏曲的基础上写成的，写作者是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的说法，是符合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的实际情况的。

罗贯中的生平不见史传，据一些笔记记载知道，罗贯中名本，贯中是他的字，别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另外还有东原、武林、庐陵等不同说法）；生活在元末明初，大约在1330到1400年期间。他所写的小说很多，相传有数十种，现在留存的，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和三遂平妖传等。他亦能词曲。所作的杂剧，现在知道的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三种。从罗贯中所写几种小说的思想倾向看，他推崇“忠”“义”，主张用“王道”“仁政”治理天下。罗贯中一定程度上看到农民起义的某种社会因素，但他所持的态度是错误的，他从根本上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他这种政治主张和阶级立场，不仅表现在三国演义里，在隋唐志传和三遂平妖传里也有明显反映。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的时代是元末明初，元封建王朝在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打击下，彻底崩溃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地主阶级篡夺了农民革命的果实，建立了朱明封建王朝。在农民夺权、地主反夺权的激烈的阶级斗争里，罗贯中的这种政治立场，与当时地主阶级进行反夺权的斗争是适应的，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

现在可以见到的三国演义的最早本子，是明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序、嘉靖壬午（公元1522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全书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至于这个刻本与罗贯中原本之间，内容上有无不同，现在没有资料可供说明。在这以后，三国演义刊本越来越多，仅明末的刊本，现在可见的就有二十多种，说明流传很广，但在内容上，几乎是大同小异。

清朝初年，毛纶（字声山）、毛宗岗（字序始）父子，假托“古本”，对三国演义重新加以修订，并逐回评论。他们在修订中，进一步突出以蜀汉为正统，明确指出，把曹魏定为正统是错误的，而采用朱熹在通鉴纲目里关于蜀汉是正统的说法，声称“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读三国志法）其次，是推崇关羽，认为关羽“报主之志坚”，“酬恩之义重”，“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毛纶、毛宗岗如此修订三国演义，是为了迎合清代统治者的需要。清朝统治者很看重三国演义，曾派人同四书一起译成满文，并对作为“忠”“义”化身的关羽大加吹捧；同时，为了鼓吹封建伦理观念以维护封建统治，清代统治者还大肆宣扬封建正统观念，他们不但以标榜“为明复仇”为号召，自居于继明的“正统”，而且还指责曹魏为“篡逆”，否认曹魏为正统。毛氏父子的修订，跟清代统治阶级的观点是正相符合的。此外，毛纶、毛宗岗对文字情节也作了不少改动，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所说：“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余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这种修饰加工工作，改变了原本若干松散拖沓的地方，使全书更加紧凑畅达，成为三国演义广泛流传的一种本

子。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刊行之后，至今又约三百年了，内容上没有什么大变动。

三国演义写作的演变过程，有值得注意的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在集体创作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作者有民间艺人，也有封建文人，他们的政治、艺术观点和创作意图各有差别，在漫长时期的传说和口头、书面的艺术创作里，集纳和熔铸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所以三国演义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思想倾向。第二，它是一部历史小说。三国的人物故事久已流传，为人们所熟悉，这就使创作活动受到某种制约，即不能完全无视原有的三国人物和故事。然而，作者虽不能全盘改变原有的人物和情节，却可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决定取舍，有意识地突出或删去某些方面，进行艺术虚构，利用各种艺术手段来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等等。所以，三国演义并不是简单地复述三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而是一部经过艺术构思和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它一定程度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关系和生活面貌；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某些罪恶；提供了认识封建社会政治、军事斗争的部分材料；并塑造出一些较有影响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颇具特色。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封建文人编修的史书，固然是为维护封建制度服务的，即使是民间的、或接近于民间的文艺，也经常受到地主阶级思想不同程度的侵蚀。因此，在民间流行的平话和戏曲，有的封建意识也相当浓重，如三国志平话、金元戏曲中的三国戏，封建意识就十分明显。三国演义的作者从维护封建统治立场出发，不但承袭了“正史”和平话、戏曲中的一些封建意识，而且还根据当时封建

统治的需要，某些方面有所强化。三国演义在鼓吹实施“王道”“仁政”的同时，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反对、攻击农民革命；鼓吹“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提倡封建道德，特别宣扬“忠”“义”等。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教导，有批判地阅读三国演义，把这部小说当作了解我国古代历史的一种思想材料。

二

三国演义反映了公元三世纪前后黄巾起义与被镇压的过程，广泛而具体地描写了魏、蜀、吴等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反映了当时某些历史情况。

东汉末年是个土地兼并剧烈、地主剥削残酷、官府徭役繁重、政治腐败不堪的黑暗时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以武装斗争来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一场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终于在公元184年象一声霹雳，猛烈地爆发了。黄巾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动摇了它的基础，直接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生存。地主阶级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对黄巾起义军进行疯狂屠杀。黄巾起义军虽然在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罪恶的东汉王朝也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无法再维持对全国的统治。地主阶级内部面临着一次新的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大小地主武装，为了取代东汉王朝，攫取财产和权力，进行了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和频

繁的军事混战。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声势浩大，“官军望风而靡”，在这种火烧眉毛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一面“火速降诏，令各处备御”（第一回），负隅顽抗；一面调兵遣将，向黄巾起义军反扑过来。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搜罗了大批地主阶级的地方武装，配合“官军”围攻起义军。原先相互争斗着的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派别和军事集团，在维护地主阶级政权的共同目标上，又相互勾结起来，采取联合行动，对起义军进行疯狂镇压。当农民革命归于失败后，官僚豪强间又重新进行混战。汉灵帝死，少帝刘辩继位，何进掌权，宦官杀何进，袁绍又起兵杀宦官，董卓赶走袁绍，后来又废刘辩而立献帝刘协。各有野心的官僚豪强，朝野呼应，反对董卓。王允设计杀死董卓，而董卓的部属又大杀王允和其他官僚。以袁绍为首的十七镇诸侯，以讨伐董卓为名义，先后割据一方，混战互杀。从镇压黄巾起义中起家的曹操、刘备和孙坚，在多次战争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曹操自“移驾幸许都”后，使用汉献帝名义发号施令，经过十一年的长期角逐，基本上统一黄河流域，成了割据中原地带的大军阀。赤壁大战以后，决定了曹操、刘备、孙权三国分立的形势。此后，三国之间又混战了七十二年，全国才得到统一。这些大小豪强、军阀，正象鲁迅所描绘的：“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南腔北调集·沙）他们为了争夺统治权，今天这几个集团聚集在一起，明天又破裂了；今天那几个集团势不两立地互相混战，明天又杯酒言欢了。三国演义有关这种情况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是在不断地进行的。这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且对认识剥削阶级的实质也有所帮助。

三国演义在反映这些政治军事集团争权夺利的尖锐斗争时，还描写了一个个政治骗局，一幅幅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场景。第七十八回写孙权劝曹操做皇帝，就是一个例子。孙权这独霸一方的大豪强，是早在做皇帝梦的野心家。但当他杀了关羽，吴、蜀联盟破裂，形势不利时，就遣使上书曹操，“伏望”曹操“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自己愿意“率群下纳土归降”。孙权这种做法是圈套，企图让曹操和刘备之间发生战争，同时，使拥汉派进一步反对曹操，所以这正是陷害曹操的一种手段，正如曹操所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又如第一百六回、一百七回，司马懿夺取曹爽兵权前，以“衰老病笃，死在旦夕”及其他种种假象麻痹曹爽，使曹爽感到“吾无忧矣！”然后发动突然袭击，一下致曹爽于死地。诸如此类的阴谋诡计，在三国演义中是屡见不鲜的。其实，这些也正是剥削阶级一贯使用的手法，他们不仅用来对付人民群众，而且也用来对付本阶级的政敌，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三国演义的这些描写，对于我们了解剥削阶级的狡诈手段，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

这些大小豪强、军阀，两手都沾满被压迫人民的鲜血，一次次争权夺利的混战，带给人民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如写董卓：“尝引军出城，行到阳城地方，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余颗于车

下，连辎还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第四回)董卓由洛阳西迁长安，临行大肆烧掠，使洛阳内外“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既行，“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如有行得迟者，背后三千军催督，军手执白刃，于路杀人。”(第六回)董卓是这样，其他豪强、军阀也何尝不如此：“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第六回)最能说明他们共同的阶级立场，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是以残杀人民来建立他们的反动专制统治，以人民群众的血泪和尸骨来维护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的。

然而，作者的描写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揭露封建统治的罪恶，恰恰相反，这仅仅是作者用来歌颂“王道”的一种陪衬。所以，他在批判董卓等人的同时，却又通过其“正面”人物来赞扬、美化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扬“王道”。

为了欺骗人民群众，地主阶级一直极力鼓吹“王道”。他们说，“王道”是封建统治的“正道”，实行“王道”的封建统治者是“宽仁爱民”的，人民对这样的统治者则“心悦诚服”。三国演义把刘备美化成一个“仁慈”的、备受人民“爱戴”的统治者，也正是把他作为“王道”的化身来进行歌颂的。在写刘备从新野、樊城撤退的那些章节里，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作者笔下，刘备对人民群众何等关心，为了人民群众，他竟然把自己的安危都置于度外了；至于人民群众对于刘备，更是竭诚“爱戴”，宁可死去，也不愿离开刘备。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刘备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不但没有丝毫的矛盾对立，而且简直到了共命运、同休戚的地

步。这种描写，歪曲了人物的阶级本质，抹煞了阶级矛盾，显然是对于地主阶级的吹捧，对于封建统治的美化，企图使人们去憧憬刘备这样的施行“王道”政治的封建统治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演义通过刘备鼓吹“王道”的同时，还把他写成封建王朝的“正统”代表。在汉献帝做皇帝的时候，刘备对汉献帝忠心耿耿，他看到“朝廷陵替，纲纪崩摧，群雄乱国，恶党欺君”，悲愤得“心胆俱裂”（第三十七回），决心“伸大义于天下”（第三十八回），为重整汉王朝而奋斗。当汉献帝被废以后，刘备在四川做了皇帝，以继汉统，作者就把蜀汉作为三国的“正统”。而对于董卓、曹操之流，作品则一再斥责他们为违反“纲纪”、破坏“正统”的“乱臣贼子”，所谓“名虽汉相，实为汉贼”。这就是说，封建王朝的“正统”、封建制度（即所谓“纲纪”）的忠实维护者，就是“仁慈爱民”、实行“王道”的人，而人民的灾难，则是由“乱臣贼子”破坏封建“纲纪”所造成的；所以就封建统治的本质来说，是保护人民、跟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三国演义作者批判董卓、曹操等人物，跟他的歌颂“正统”、鼓吹“王道”一样，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也正是从这种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三国演义对农民革命直接进行了诬蔑。小说所写的黄巾军，是汉末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运动。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深刻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作者却一再诬蔑他们是“黄巾贼”，并通过小说中所谓“正面”人物之口，公然主张把农民起义军斩尽杀绝，“若容其降，无以劝善”（第二回），反对农

民革命的态度，十分坚决，十分鲜明。但在这里，却也就同时暴露了“王道”的虚伪性。正如鲁迅所指出，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件事）。封建统治阶级吹嘘的什么“仁慈爱民”、“广布恩德”，全都不过是欺骗人民、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虚伪口号，在这些口号的背后，是对人民群众极端残酷的屠杀和迫害。大肆宣扬“王道”“仁政”的三国演义，同时却又公然主张把起义人民斩尽杀绝，这也就有力地说明了“王道”的反动实质。

总之，三国演义虽然为我们提供了若干对于封建社会的历史具有认识意义的材料，但却宣扬“王道”、鼓吹“正统”、反对农民起义。所以，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批判，剔除它的封建性糟粕，明确认识作品所歌颂的“王道”、“仁政”完全是对人民群众的欺骗，同时也要看到，作品中的所谓“乱臣贼子”正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封建统治的体现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三国演义的有关材料中看到：在黄巾起义被镇压以后，社会生产力遭受空前大破坏，人民大量地被屠杀，地主和农民这两个对立的阶级过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人民生活在这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百姓皆食枣菜，饿殍遍野”（第十三回）。而以董卓之流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则过着奢侈豪华、纵欲无度的生活，“别筑郿坞”，“内盖宫室，仓库屯积二十年粮食；选民间少年美女八百人实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积不知其数”（第八回），形成两个阶级鲜明的对比。这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封建社会的罪恶，认识到农民起义被镇压以后，地主阶级对人民决不会实行什么让步政策，而是更加疯狂地进行榨取和迫害。

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然而，剥削阶级却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所创造的，三国演义的作者也同样如此。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谄，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笞，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

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在刘备军队于博望坡大破曹兵，“班师回新野”时，作者又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第三十九回）在这种颠倒历史的描写中，封建统治者刘备就成了救世主。为了表现刘备如何受到人民拥护，竟写了

猎人刘安杀妻献肉这样的情节。刘备兵败徐州时，人民“皆争进饮食”，猎户刘安“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第十九回）。这种不真实的对地主阶级的吹捧，加重了刘备形象的虚伪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是最切当的批评。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

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

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

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砲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真是坏事干尽。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要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在作者看来，即使是统治阶级中这样残暴阴险的“乱臣贼子”，也仍然是远远高出人民群众之上的，是人民群众顶礼膜拜的对象。在曹操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百姓叩谢。”（第二十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评价虽然很不相

同,但通过这两个人物形象,却同样宣扬了“英雄”史观。

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郢中歌里评论曹操说:“郢则郢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

《三国演义》中的这种“英雄”史观,又是跟神权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三十五回)。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